



(1918—2000)

明
代
的
漕
运

黄
仁
宇
全
集

第
一
册



(1918—2000)

明
代
的
漕
运

黄
仁
宇
全
集

第
一
册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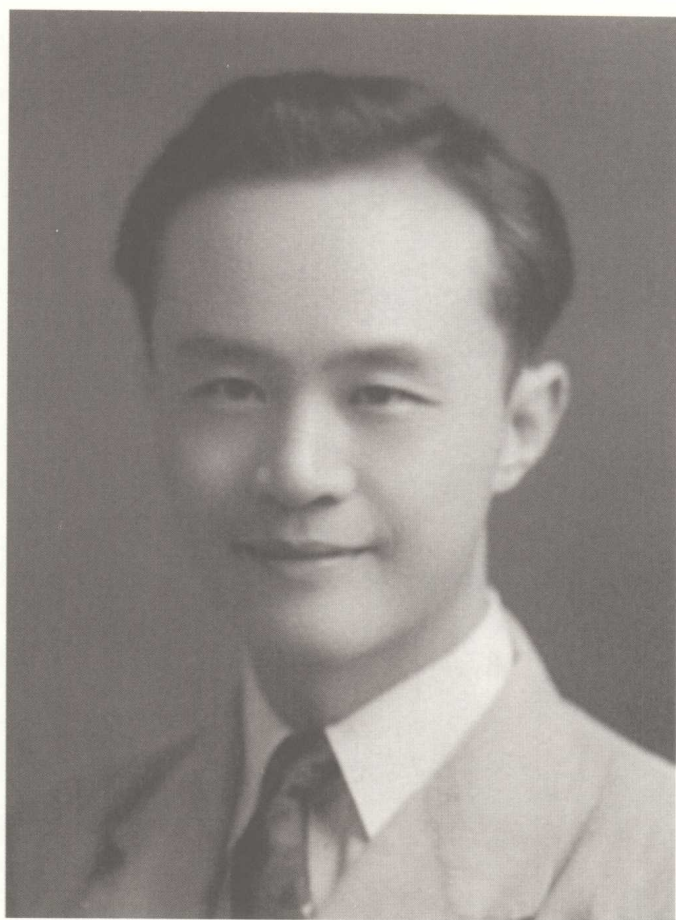
明代的漕运 / (美) 黄仁宇著; 张皓、张升译.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7.7

(黄仁宇全集; 1)

ISBN 978-7-80195-659-0

I. 明… II. ①黄… ②张…
③张… III. 漕运—交通运输史—中国—明代 IV. F55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64582 号



年轻时代的黄仁宇



1956年黄仁宇在美国读研究所时，与已经取得博士学位且正任教于
圣母大学 (Notre Dame) 的弟弟黄竞存 (Dr. Gene Huang) 合影



1952 年黄仁宇（右一）就读密西根大学时

出版说明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以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学术观点和写作风格,在读者中享誉甚高,受到广泛关注。一直以来,他的著述的单行本散见于海内外多家出版社,版本形式、内容选取不尽相同,为了让广大读者更方便、更全面地阅读、研究和收藏黄仁宇先生的作品,我社将黄仁宇先生的史学专著、论文、随笔、小说、通讯报道和自传等编辑整理,以《黄仁宇全集》(共十四册)的形式首次出版。

对于编入全集之前各单行本原有的作者注、译者注,我们用注释号①、②……标注;全集编者注则以星标(*)标注。另外,在编辑的过程中,我们对个别著作在内容上有所节略,特此说明。

黄仁宇先生生前留下的文字,还有一些尚待整理、出版,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我们将补入全集。

全集得以顺利出版,得益于黄仁宇先生的弟弟黄竞存先生、黄仁宇先生的儿子黄培乐先生和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发行人林载爵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协助,谨向他们深表谢意。

九州出版社

我的哥哥黄仁宇

黄竞存

我的哥哥黄仁宇和嫂嫂格尔住在美国纽约州 New Paltz 市,在 1999 年除夕中,我在西岸和仁宇兄通了两次电话,在交谈中互相勉慰,庆幸平安地进入一个新世纪。

2000 年 1 月 8 号,新世纪刚度过一星期,那天加州气温平和,我们还在计划周末活动,突然间仁宇兄的儿子培乐(Jefferson Huang)来电话,那时是加州时间上午 11 点半左右,培乐的语音很平稳,可是消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象到的:他说父亲在三小时前,在去附近一间电影院时,突然因心脏病(Cardiac Arrest)不治弃世,就在这个简短的电话中,我和仁宇兄作不辞的永别了。

过了一两天,我才知道仁宇那天是由他夫人格尔驾车到离 New Paltz 二十多英里的一家电影院看一部文艺影片,片名叫《雪降洋杉》(*Snow Falling On Cedars*)。他们刚到达电影院,仁宇兄说身体不适,在进门厅室,一坐下来就晕倒,当时由救护车送到附近医院急诊,医生已束手无策了。

当时我除了伤感之外,还有一点诧异:平常仁宇兄做事认真,不爱浮华,为什么要在周末白天去电影院呢?为了了解真情,我就在网络中寻找这部《雪降洋杉》影片的背景,才知道这影片是根据 1994 年间一部最畅销的小说编摄的,小说已经译成中文出版,书名叫《爱在冰雪纷飞时》,故事发生在西雅图城海湾中一个小岛。在大雪飘零之际,一个当地新闻记者查访法庭审问一件命案,其中包括不同种族男女间的爱情,小岛上住民的心理,私人间的嫉忌和偏见,都反映在记者的心目中。照我的猜测,仁宇兄对写小说有兴趣,他去看这影片,不是纯粹为了娱乐,而是要把文艺著作和电影两种媒体相互比较,有研究的性质。

当天他们夫妇离家去电影院时,仁宇含笑对格尔说:“老年人身上有这

么多的病痛，最好是抛弃躯壳，离开尘世。”随后格尔开车沿赫逊河岸转折，仁宇继续将身后事作为话题，和格尔检讨。这场经历在格尔嫂的心目中，留下了不可毁灭的印象。

我和仁宇兄从小在湖南长沙长大，一直到中学毕业，我们的父亲黄震白，别名种苏，是中国革命初期同盟会会员。在长沙时，我们兄弟年轻，父亲又常赴外省工作，在我的记忆中比较深刻的是在客厅墙上挂的国父孙中山的手笔，题赠“种苏同志”，中间是“博爱”两个大字，下首是孙中山的签名和印章。这幅字帖一直挂在家中，到了1939年抗战开始，家人分散，这手帖就不知道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

黄仁宇在十四五岁左右(1932年)开始向当地报纸投稿，当时湖南日报副刊，连续登载他写的世界名人传记，每篇都有他自己手描的人物画像。黄仁宇的写作热忱，从中学时代开始，从未间断，以后他继续在文章书籍中加入自己的插图，包括白描画、地图、表格和作战形势图等，都一手细心创制。他的私人用笺，上面就有一幅白描画，描写过去运河漕运情形，原来是他写明代经济史中的插图。

1938年仁宇兄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念电机工程。刚过了一年，全国抗日战争开始，国内比较有名气的大学都辗转迁入内地。黄仁宇放弃学业，在长沙参加抗战日报，作编辑访问工作，那时抗战日报的社长是田汉，总编辑是廖沫沙。

黄仁宇于1943年由重庆飞往印度，参加中国驻印度远征军，在孙立人部下作参谋，常到战场视察，仍旧写文章，大部在重庆大公报发表。在北缅甸密支那之役，他到前线观察，被日军藏在树丛中的狙击兵射中大腿，运到后方调养。

抗战胜利之后，仁宇兄到美国 Leaven Worth 参谋大学深造，后来又随日本参加中国驻日代表团。在这个期间，我们只在日本东京匆匆见面二十四小时，一直要到1952年，他决心解甲读书。我们兄弟，才有比较多的见面机会。

从1952年开始，黄仁宇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念书和工作。那时他已经是三十四岁，把半生的事业成就全部放弃，重新和年轻的学生们生活在一起，这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他采取这途径，表示对自己写作著述的能力有

信心，才愿意在半工半读的条件下，发愤攻读。

黄仁宇在密西根大学 Undergraduate School 念了三年，由新闻系转到历史系，取得学士学位，在这段时间，除开读书、工作之外，他对年轻大学生的课外活动一样有兴趣。密西根大学是美国中西部足球联盟的一员（Midwest Big 10）。秋天是足球季，各校轮流比赛，每场的观众上万，黄仁宇戴上黄蓝两色上有校徽的便帽，热烈参加。

随后黄仁宇继续念研究院，一直到 1964 年，取得博士学位。美国政府对大学文科（Liberal Arts）不大重视，政府研究津贴很少花在这个部门，因为这个缘故，文科研究生都要自己找工作维持。

黄仁宇一面工作谋生，可是仍专心读书。我看着他从一个业余性质的作者，蜕变为胸藏万卷的学人，他以后的成就，都是在这个期间奠定的。仁宇兄研究明史，把《明实录》一百三十三卷从头到尾研读，以后写文章，下结论，都引证纪实，不凭空虚构，也就是他为学过人之处。黄仁宇辞世之后，嫂嫂格尔寄给我一盒文件，其中有黄仁宇最近十年的读书工作记录。我打开一本，看到他 1992 年 12 月的日记，其中一个星期，他在五天之内，把《大史长篇》，重新研读一遍。我不知道《大史长篇》是怎么样的书籍，请教一位国史专家，他说大概是明朝王祿著的《大事记续篇》（七十七卷）和朱国桢著的《大事记》，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黄仁宇读书认真的情形。

仁宇兄的名著《万历十五年》开始是用英文写的，在 1981 年由雅礼大学出版所印行，当时为美国名作家 John Updike 发现，在 *New Yorker* 杂志写文推荐，同时这本书也列入美国历史书五个最佳作品之一。翌年《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在北京印行，由廖沫沙题笺，印在封面。这题笺也有一个小故事，我在 1980 年 9 月间，参加美国航空学会访问中国航空工业，途经北京，这时黄仁宇已经计划把《万历十五年》在中国印出，托我和妹妹粹存去拜见他的旧友廖沫沙，请他题笺。我现在手头还有仁宇写的一个短简，谢谢我们弟妹替他取得廖沫沙的题笺，并且说：出版书籍，和其他工程一样，一定要有多方面的协助支持，要谢谢你们在北京的联系工作。

黄仁宇个性强，不论学术和日常交往，都是心有成竹，不轻易改变初衷。可是为人谦和，不事夸张。《万历十五年》在大陆和台湾畅销，他对我一字不提，直到我们的表弟李承露从台湾来信，报告情形。我打电话给仁宇兄说：

“听见你在台湾出版界和读者心目中声名鼎盛。”仁宇兄没有骄意，只问：“是哪个人告诉你的？”

黄仁宇的第二本重要作品是《中国大历史》，这本书在美国出版时是1988年11月。可是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到纽约州去看他们夫妇，仁宇兄就告诉我：他对中国历史有一个新的研讨方式，和美国各大学中国史专家看法完全不一样。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这学科的研究内情，只觉单刀匹马，和一班学术权威打对头，不是智举，就将这想法坦白陈述，黄仁宇一点也不同意，话题就终止了。

黄仁宇生性豪爽，古道热肠，对人诚恳，人或有机谋，他视而不见。他在New Paltz住处简素朴实，他写作的厅房面对着纽约闻名的Cat skill山地游览区，可以看见日出日落，风云变幻，在黄仁宇的心目中，比什么高楼大厦，都要胜过一筹。同时他注重储蓄，家有余资，都细心投资。

黄仁宇夫妇爱旅游，在英国剑桥大学工作时，曾遍游西欧各国，在美国游历东西岸，最后在1998年春来加州访问，和家人欢聚之外，他们夫妇并开车到San Diego和Las Vegas游览。

仁宇兄最后一次旅行，是在1999年10月应葡萄牙政府邀请，到里斯本参加澳门归还中国纪念会。在会中黄仁宇发表论文，题为“中国的经验——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黄仁宇欢喜宾客，New paltz附近有几家餐馆，是他家待客之处，其中有两家在赫逊河畔，风景优美。这地方也就是他写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名称的来源，另一家中国餐馆，叫“小熊饭店”，地址靠近Woodstock，是Rock Music发源之处，餐厅背山近水，非常风雅。

仁宇兄常说：“我一生经历过中外各阶层的生活，不论是治世乱世，无所不闻，无所不见。现在我个人要做的事都已做了，可一死而无憾。”这种看法，和他最后一天和格尔嫂所讲的话，如出一辙。

撰写此文，部分原因是为了申请密歇根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

1964 年

博士学位答辩委员会主席及成员：

主 席：费维恺教授

成 员：赵 纲副教授

雅各布·M. 普里斯副教授

余英时副教授

前 言

从1959年起，我就计划撰写明代的漕运。当时在亚利桑那大学任教、目前在奥克兰大学工作的贺凯教授，从那时起就不断给予我帮助和鼓励。贺凯教授在图森写了一封长信给我，建议列出一个文献目录，弄清研究方法与目的。他到密歇根后，把他个人收集的有关明代历史资料提供给我利用。对我来说，这些资料非常宝贵。此外，在许多场合，他舍弃了自己非常宝贵的时间，耐心地倾听我的想法，并给予我有独到见解的评论。因此，我从内心里对贺凯教授要表示深深而诚挚的谢意。

对于在明史研究领域走在前列的许多学者，虽然我同他们的联系并不像同贺凯教授那样频繁，但他们也像贺凯教授一样，对我的研究关怀备至。除了密歇根大学为我组成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不厌其烦地帮助我外，还有一些学者阅读了我论文草稿的全部或部分，作出评价并提出改进建议。这些学者包括：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和杨联陞教授、耶鲁大学的约翰·W. 霍尔教授、加利福尼亚大学巴纳德学院的约翰·梅斯基尔教授，以及明史文献研究项目小组的L. 卡里托·古德里奇教授。我要对他们表达深深的谢意。尽管他们提出了许多良好建议，论文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错误，这些错误当然要由我自己负责；这一情况并不能说明我在最后定稿的论文中所表达的观点，都得到了他们的赞同。

1959年冬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期间，我有机会拜访了外交学院的韩丁教授。他热情地接待了我。虽然我们两人在漕运的功能以及中国历史其他问题上看法不同，但这丝毫影响不了我个人对他的钦佩。我对他的尊敬具有深深的含义——他很早就在明史研究领域中跋涉，而我，才刚刚涉及，只是一个初入者。

在我论文写作期间，还有许多人帮助了我。这些好心的人包括：吉非尔斯与罗塞蒂有限公司的丹尼尔·J. 博恩先生，他不断地鼓励和激

励我完成明代漕运的研究；博恩夫人，她阅读了论文全部初稿，提出许多如何改进英语表达的建议；密歇根大学远东图书馆的铃木彦先生，他帮助我安排论文中的日文标题，并将之翻译成拉丁语；安·A. 科尔蒙内小姐，她帮我打印了初稿；罗斯玛丽·J. 赫里恩夫人，她帮我打印了最后的定稿。我还要感谢如下人员：吉非尔斯与罗塞蒂有限公司的卡尔·A. 吉非尔斯先生，他是我现在的雇主，正是由于有了他的帮助和理解，这篇论文才得以完成；霍勒斯·拉克汉蒙研究院的拉尔夫·A. 索耶院长和弗里曼·D. 米勒院长，他们两人同意在1959年和1963年设置研究生研究基金，资助我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其他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

迄今为止，明朝历史仍然存在许多争议，而且复杂。而一般说来，明代漕运问题涉及明代的许多因素，例如皇帝及大臣的性格和个人风格、政府机构、官场惯例、重大的全国性事件、财政制度、国民经济、流行看法、地理和工艺技术，等等。关于这些问题的原始资料虽然很多，但其中大多数已经被现代学者重新整理和加工过。由于在许多领域中仍然缺乏对此种整理加工的估价，因而在写作这篇论文时，我每时每刻不得不依靠自己的主观判断，匆忙翻阅，快速选择。由于明代漕运是一块尚未被人研究的处女地，而我又是刚刚涉及这一领域，因而论文中所提出的观点不可避免地存在问题。我充分地意识到会出现许多错误，也认识到会忽略许多重要问题，因此，任何使我能注意到某些特定错误的建议或评论，我都十分欢迎。

为了方便阅读，我尽可能把中国度量衡单位换算为西方式的。不过，“两”和“石”除外，因为它们是中国常用单位，是中国式的“盎司”和“蒲式耳”。

黄仁宇

1964年3月31日

目 录

编者说明	1
我的哥哥黄仁宇	黄竞存 1
前言	1
第一章 京杭大运河的背景和本文研究的目的	1
第二章 京杭大运河的地形概况	15
第三章 明代管理大运河的行政机构	27
第四章 漕粮运输	46
一、漕粮制度的发展	46
二、军运组织——漕军	58
三、国家支出下的京师漕粮储存拨付	72
第五章 宫廷供应品的漕运	98
第六章 征税、商业、旅行和劳役	121
一、征税	121
二、商业	131
三、旅行	145
四、劳役	159
第七章 结论	165
附录	
一、印版图和草图	171
二、《明实录》中所记载的输送到京师的漕粮	175

三、《大明会典》中所记载的几省和南直隶几府州的漕粮份额	178
四、几个内河河港的税收份额	179
文献目录注释	180
一、极为有益的文献索引	180
二、明王朝和政府机构组织的历史纲要	180
三、经济和社会背景	183
四、大运河及其地理情况资料	184
五、漕河的行政管理及相关制度	186
前言及正文中的人名、地名及其他专有名词英汉对照表	188
译后记	202

第一章 京杭大运河的背景 和本文研究的目的

一系列连接华北和长江三角洲的人工水道被认为是大运河^①后，错误看法就常常出现。大运河是由几个不同的河道组成的，它们各自流经的地域不同，各自拥有的历史起源也不同，因而并不具备共同的特点。如果把不同的河道视为一条运河，那么就会忽略许多相关而又必要的细节。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有理怀疑把运河称为“大运河”是否合适。虽然大运河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水利工程，但是它并不总是具有其名字所赋予的辉煌和壮观。

不过，这并未给制图者带来什么严重困难。实际上，即使在今天每种质量较好的地图上，大运河都被汇为一条连接京师和南方的杭州的船道运河而存在^②。唯一的变化出现在漕河北部上。由于漕河北段沿着两条河流的自然水道而延伸，因而有些地图把它们视为自然河流，而另一些地图则视为人工水道，标上了人工运河的图例。当然，这只是一个小小

① 作者在不同情况下分别使用了 the Grand Canal、the canal、the canals、the canal system 和 Ts' ao Ho。后者毫无疑问指的就是漕河。至于其他，作者虽然有时用词并不严格，甚至随意使用。比如 the canal 和 the canals 不分，the canal 和 the canal system 也不分，但基本思路是：the Grand Canal 指的是北京到杭州的京杭大运河，the canal 指北京到瓜洲的运河，即 Ts' ao Ho，the canals 指由京杭大运河及其他小运河或分运河组成的运河体系，the canal system 指因漕运而设置起来的体系。因此，我们在翻译时推断作者意思，分别将 the Grand Canal、the canal、the canals、the canal system 译成“京杭大运河”、“漕河”、“运河”和“漕运体系”。有时，由于作者对 the canal 和 the canal system 不分，所以 the canal system 有时也译为“漕河”。——译者注

② 参见：《商业地图集和市场指南》(Commercial Atlas And Market Guide) (纽约，1961 年版)，页 532。
《世界时代地图集》(The Times Atlas of the World) (中世纪版，伦敦于 1955 年再版)，页 1、21~22。
《兰德·麦克纳利全世界地图集》(Rand McNally Cosmopolitan World Atlas) (纽约和旧金山，1962 年版)，页 34。
《世界地图册》(莫斯科，1954 年版)，页 153~154、147~148。
《美国牛津地图集》(The American Oxford Atlas) (纽约和牛津，1951 年版)，页 61~63。
《格罗塞尔·赫德尔地图集》(Grosser Herder Atlas) (弗赖堡，1958 年版)，页 169；页 171。